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可持续发展

□朱立志 我国在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成绩是显著的，然而挑战也是严峻的。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发展理念没有从深层次上对接可持续发展，在体制机制上没有实现科学地转变，在政策上体现得也不够充分，更没有科学完整的措施体系保障，加上内外部因素叠加，新旧矛盾交织，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水缺、生态类型多样、粮食安全压力大，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是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确保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一是在发展路径上，在加强农业环境治理的同时，通过深化结构调整、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着力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二是在发展目标上，着力实现国内生产、国际贸易及农业“走出去”的供给能力与资源休养生息的动态平衡，坚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三是在发展步骤上，科学规划，有序推进，试点先行，突出重点，先易后难，优先在生态环境问题严重、防控治理技术成熟的地区开展试点，然后逐步示范推广。

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要突出资源高效利用、环境有效治理和生态安全保护，旨在调整我国农业的发展思路和目标，使之从“保供增收”拓展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要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主攻方向，以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增收

为前提，以体制机制改革、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为动力，以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为原则，借鉴历史和国际经验，有效应对面临的严峻挑战，突破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充分利用已有的工作基础与条件，谋划重大举措，切实推进现代农业与可持续性农业同步发展。

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要顺应时代要求，坚持家庭经营与多种经营形式共同发展，坚持传统精耕细作与现代技术装备的相辅相成，坚持高产高效与资源生态永续利用的协调兼顾，坚持政府支持保护与市场决定性配置资源的功能互补，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作者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资源与环境研究室主任)

农村寄宿生“亚健康”状况令人痛惜

□董文龙 农村中小学的寄宿生，尤其是其中的留守儿童寄宿生，他们的生活条件，身体和心理状况普遍令人担忧。据相关调查显示，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寄宿制学生的数量约为3276万人，其中小学生近1100万，初中生2200万，而在这之中，留守儿童占约60%。

据相关调查，我国农村大部分寄宿生的住宿条件普遍较差，狭小的宿舍内挤满了二十几个学生，热水供应不足，伙食条件差，卫生条件也令人堪忧。而这些寄宿生的身体素质也比非寄宿生要差，他们的平均身高比非寄宿生要矮6~10厘米，体重轻3~9公斤。因生活空间小，缺乏亲人的关爱，普遍存在孤独、无助、迷惘的心理。

孩子是祖国的“春天”和希望，童年是孩子生命的“早晨”，但我们却不幸地看到大量农村寄宿生早早陷入了一种无论从身体上来说还是从心理上来说，都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我们怎能不对此扼腕痛惜。

之所以会形成今天农村寄宿生堪忧的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我国施行的“撤点并校”改革，据相关统计，从2001年到2010年十年间，农村小学减少了22.94万所，减少了52.1%；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少了近六成；农村初中减少了1.06万所，减幅超过1/4。十年“撤点并校”在实现了优秀教育资源集中、聚拢、共享的同时，也连带造成了中小学生学习远的难题，据10省农村中小学抽样调查显示，农村小学生学校离家平均距离为10.83公里，初中生离家的平均距离为34.93公里，在这种条件下，寄宿制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

其次，在这3200多万农村寄宿生中，留守儿童占了约60%，父母外出务工，家中孩子无人照料，也是农村孩子被迫寄宿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外出务工的农村家长认为只要学校能为孩子提供最基本的吃饭住宿保障，便不顾孩子的生活状况和心理健康，甚至有些家长忙得时连孩子的电话都不接，这更加剧了孩子心理上的孤独感和其他负面情绪。

另外，这些农村寄宿制孩子生活条件这么艰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学校住宿条件硬件投入不足，如果他们能够有窗明几净、宽敞舒适的住宿环境，如果他们能有可口的饭菜，甚至简单到他们能有足够的热水供应，不需要太多，他们生活的幸福感就会大大提升。可现实情况是，很多农村中小学，连建学校的钱都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教学基础设施的投入尚存不足，改善学生寄宿条件则更是无米之炊。

[分析评论]

“厕所革命”彰显农村发展内涵转换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吉林考察时指出，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新农村建设也要不断推进，来来个“厕所革命”，让农村群众用上卫生厕所。“厕所革命”命题为人们审视我国农村发展的内涵转换及经济社会政策的适应性调整指明了方向。

□高帆

农村发展理念主线呈现趋势性转换

农村发展是指一国基于某种发展战略，依靠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影响农村经济社会等领域并由此获取相应的成效，理念（农村发展为了什么）以及主线（农村发展针对什么）构成了解析农村发展内涵的基点。

就理念而言，我国农村发展正从工具功能向价值功能转换。发展经济学强调农业对国民经济具有产品、要素、市场、外汇等贡献，这种理解更多是将农业和农村视为推动其他部门发展的“工具”。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加速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改革开放之后的较长时期内，农村发展则承担着为其他部门提供劳动、土地和资本的要素供给职能，城乡二元结构正是此种农村“工具功能”的客观结果。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在战略取向上已经将农村发展本身视为整体发展的重要部分，将农民的福利水平提升本身视为发展目标的基本指向，从价值角度而不是工具角度来看待农村，体现了发展理念的重大转折，“厕所革命”与农村发展价值功能的凸显是逻辑一致的。

就主线而言，我国农村发展正从经济主导向社会主导转换。农村发展包含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等议题，在不同时期，各议题的相对重要性并不相同。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发展的主线具有经济主导特征，改革开放之前侧重农产品供给以及工业资本形成，改革开放初期则强调农民增收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缩减，当前农业现代化以及农民增收仍是重要的，但其相对重要性可能会因社会议题攀升而减弱。原因是：我国不仅存在以城乡收入差距为标度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存在以城乡公共产品以及社会保障供给差距

为标度的二元社会结构，且伴随时间的推移，二元社会结构对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不断凸显。据此，农村发展就需从重点缩减二元经济结构转向更多回应二元社会结构，我国提出2020年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具有极强的实践针对性，而“厕所革命”正是上述农村发展主线转换的重要体现。

“厕所革命”表面上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特定工程，但其凸显的却是农村发展内涵的趋势性转换，这种转换表明我国对城乡关系的认识在提升，且统筹城乡发展的能力在增强。

从“增长竞赛”转向“民生竞赛”

我国推进农村发展内涵转换的条件渐趋成熟。例如：城镇化导致农村人口占比相对下降；政府财政能力持续增强；农民收入不断提高等等。那么，在政策实施层面，如何切实体现城乡并重并凸显农村社会保障及公共产品供给，尤其是对地方政府而言，如何从“增长竞赛”转向包括农民福祉改善在内的“民生竞赛”？

就市场而言，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农民是实现农村发展的基本动力，农村发展不能单向度依靠政府“给予”来实现。价值转化和社会主导在本质上取决于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厕所革命”有赖于农民的消费方式转化和支付能力增强，“造血”功能是农民全面发展和福利水平提升的根本途径。新时期我国应着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市场在城乡土地、资本和劳动等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城镇化和农村经营方式变革、人力资本提升等实现农民的收入增长，进而促使农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自发性改变。在社会学意义上，我国应在市场完善的基础上增强城乡居民的流动性，以凸显城乡消费方式的交互影响，上述理念转变和能力提升在农村发展内涵转换中将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就政府而言，农村发展中政府的强制干预不可取，即使是“厕所革命”，政府也应尊重农民的意愿和诉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作用不重要。在农村发展内涵转换中，政府的作用首先体现为制度完善，例如：农村土地经营权的范围扩展、期限延伸有助于土地要素的有效配置，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政府还应完善城乡产品以及要素市场，这对于农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消费方式转变尤其重要。此外，政府还应增强对于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供给。例如，“厕所革命”的部分环节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规模经济特征，政府可通过财政补贴、购买服务等促进此类基础设施的发展。从更深的层面讲，农村发展内涵转换更多依赖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和偏好，当前我国需要完善政府纵向的行政激励机制和财政管理体系，进而推动各级政府更好地“为民生而竞赛”。

值得强调的是，在价值功能和社会主导的农村发展格局下，部分属于特定群体中的“公共产品”，往往独立于市场供给和政府供给之外，但其对农村发展的内涵转变又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政府应在法律框架下，为农村各类自发性经济或社会组织发育提供广阔的空间，鼓励农民基于合作的成本-收益分析形成“自由人联合体”。简而言之，农村发展内涵转换有赖于市场-政府关系的适时调整，这种调整当以解决实践问题为导向。市场与政府两者作用的细分、重组和交互演变，正是我国农村发展内涵转换的新型动力源泉。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

农民工信息亟需纳入征信体系

□李彦赤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指出，支持农民工、大学生和退役士兵等人员返乡创业，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使广袤乡镇百业兴旺，可促就业、增收入，打开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新局面。

创业需要热情，更需要物质基础，而资金恰恰是返乡创业主体必不可少的。为了让返乡创业者“不差钱”，《意见》围绕“强化返乡创业金融服务”提出多项措施，其中关于“完善返乡创业信用评价机制”的内容，无疑是一项亟待深入推进的工作。

眼下，农民工返乡创业也亟待征信体系发挥作用。面对创业项目，创业者在投入自己积累资金的同时，少不了要到金融机构借款。银行或其他非存款类信贷机构在对农民工群体提供贷款

前，需要通过征信系统查询借款人的历史记录、负债水平等相关信息。然而，长期以来农民工“候鸟式”迁徙，与金融机构联系多发生在银行卡工资支付领域或者信用卡消费领域，导致其在征信系统中信息不够完整，令金融机构难以做出征信判断。因此，应尽快将农民工相关信息纳入征信系统，使金融机构能基于借款人过去和当前的还款行为、负债水平以及其他信息，有针对性地提供信贷帮扶，满足创业资金需求。

面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热潮，各方应当高度重视并合力做好农民工征信工作。对于返乡创办企业的农民工，地方政府要把工商注册信息以及水、电、气缴费等公用事业信息导入央行征信系统，探索建立农民工诚信台账和信息库，引导金融机构对经营正常、信誉较好的农民工予以直接信用贷款。金融机构也应积极完善配套跟进措施，结合返

乡农民工信用状况、企业财务信息等做出放贷决策，强化信用风险管理，探索出一条农民工信用与银行贷款良性互动的新路径。此外，还可以通过引入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推动社会中介力量开展农民工征信。譬如芝麻信用通过分析网络交易及行为数据，对用户进行信用评估。近期，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宣布与腾讯征信开展合作，接入腾讯征信信用评分、反欺诈等征信产品，更拓展了金融机构与信用服务机构合作的潜在空间。

总之，当前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征信体系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障碍，如农民工地域分布与职业分布情况较为复杂，信息集上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但只要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把国务院出台的《意见》当做解决“三农”实际问题及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来抓，就能找到推进农民工征信体系建设的“金钥匙”。